

自他戴上耳机之后

王春鸣

那个乳白色外挂式耳机,是我辗转了几个专柜,咨询了好几个音乐学院的学生,才买下的生日礼物,可是小树一戴上,我立刻追悔莫及,原来最容易让父母与青春期孩子隔膜的,不是代沟,而是耳机。

生日在周一,和往常一样,他必须早上6点半出门,晚上9点钟到家。这一年他初二了,13周岁了。那种喊上家人吃一顿,约上同学玩一场,或者由我出面让老师减免一点作业的往日时光不可能再有。至于一起爬山看个日出那种我觉得有意义的事,更是变得像童话一样。我真的很想找一点乐子给他,可是他晃着一把写空的水笔笔芯,跟我说:“你什么都别买,我什么都不需要,我现在能需要什么呀!做作业也来不及。”

说得我洒了几滴眼泪下来。我恨不得把全世界送给他,但是其实我什么也给不了,连睡眠也给不了。

还好他觉得自己比同学幸福一点,他有一个喜欢的女孩,而我同意他们每个周末在网上聊一会儿,说个晚安;他喜欢音乐,多晚多累都要弹会儿

吉他。他说一天中最放松最惬意的事情就是上洗手间和洗澡,因为那段时间可以听歌,渐渐地他在里面呆的时间长到我无法忍受。老师们知道了,都说我是错的,我讪讪地承认,但是心里不服,如今这时代,有谁知道怎样做父母才算是正确?

小树听的歌都是很青春口味的英文快歌,特别烦人,但他说这是他紧张无趣的生活里唯一的阳光,好吧。难得有一两首我也能听懂,比如 Lemon tree,每每听他跟着哼歌,我都觉得那个音乐世界其实好伤人也太孤独;他也喜欢汪峰和许巍、宋冬野,我承认他们的声音里都有一种对自由的向往。

如果这就是他的所爱,我希望他能听到好一点的声音,耳机会把音质提纯,还可以让我免受干扰。

小树看见我拿出的礼物,也没表现出多大欢喜,倒是先怪了我乱花钱。但还是勉为其难地戴上了。万万没想到,一戴上,他立刻目光飘逸,与我不在一个三维空间。我问他怎么样,他面带微笑,摆摆手进了洗手间。

这以后每次开车接他回家,我都觉得后座静得发慌,问他怎么不说话,根本不理我。我转过头去,他便掀起一只耳机,用大声音问我:“什么?你说什么?”有的时候,静了好长一段路,车厢里会忽然爆出他比平时高了几倍的声音,那是听到高兴处,他在随音乐哼唱零章断句。

自从小树拥有了耳机,我便失去他更多一些。从前无奈一起听着他爱的那些歌,我被审美与青春的代沟搅得烦躁不安,觉得尽量去理解包容一个00后真是不易。现在他依然在我身边,我却听不见了他正在听的那些声音,连批评和评价都没法提出,越发觉得在他的生命里,为娘的失落与淡出。

不甘心的我,因此对大一新生开了一门选修课,流行文化研究,那些孩子都是提到韩庚、吴亦凡就眼睛发亮的,也有对 Coldplay(酷玩乐队)甚至 AC/DC 如数家珍的,因此特别爱我。而我,从他们那里,又听到了被我自己买的耳机隔断的那些声音,重金属和电子声的热闹里,我又孤单又努力。



都有一颗少女的心

马塞洛



首先必须郑重声明,这里探讨的是少女的心,即网络上常见的“少女心”,绝非“少女之心”——有点经历的人都晓得,《少女之心》是被禁过的小黄书。余生也晚,没有看过,但是高中的时候听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巴比伦讲过故事梗概。“巴比伦”是绰号,源自那首好像一度也被禁过的《梦中的妈妈》。他只会第一句,或者只是最爱唱第一句吧,发音、尤其是重音又很有特点,几次念叨下来,“巴比伦”就非他莫属了。

后来我才晓得,他的口音是洋泾浜英语里的重要分支之一——川沙音。昨天晚上开同学会,大家都说巴比伦怎么失联这么久了。有过他手机号码的说,后来打过去,只听到一个女声说“嗯”“嗯”,也是川沙的味道,但是就是不讲他在哪里、怎么联系,也是奇了怪了。随后话题就转到现在的小囡都不大说或曰不会说上海话,就岔开了。

这个同学会是为很久没见的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女生举办的。当年真的叫做没有“少女心”这种说法,不然的话,她就是我们班当之无愧的“带盐人”(此处省略关于追星的一万字,大小姐脾气五千字)。她也是涉外同学里面最爱国的,至今都坚持保有中国国籍,但是明显平时不常刷朋友圈,不晓得“拆散一对是一对”的道理,勇敢地把她的大不懂中文的华裔老公带过来了。而且大概真的因为南加州的空气现在治理得比较好,她的样子是在场姐妹们中间最年轻的(不过这也可能和她扎的那个歪歪的马尾有关系——那个发髻是《天涯同命鸟》还是《人在旅途》里面流出来的?这真是一个暴露年龄的话题,赶紧打住)。她老公一看就是那种纯良和善的外国长大的小孩,因为是华裔还功课好(黑框眼镜也是有力的佐证),和阿拉古灵

精怪和上海小姑娘在一起,真是般配啊。可惜伊实在听不懂上海话,我又忙着吃菜(为了招待没怎么吃过本帮菜的上海女婿特地点的,除了我不吃的草头圈子差不多都全了),就没有和他科普许多新概念(也是怕他没有时间吃菜啦,你们不要都盯着我看嘛)。

那么,少女心到底是什么?窃以为虽然都是网络上红出来的词,少女心和玻璃心什么的还不一样,除了对事物的敏感之外,还有一些不谙世故的天真烂漫在里面。一定要引经据典的话,大约可以上溯到《红楼梦》,从“女儿是水做的”等等来分析(此处再省略当代红学一万字)。最简截的法子是找反面教材——王善保家的法流之所以那么讨人厌,就因为丧失了少女心。更绝的对立面佐证是——男人为什么是“泥做的骨肉”?因为从来就木有少女心

嘛。还好现在新社会了,老阿姨都可以跳广场舞,大叔有颗少女心,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体了——

我司和我在少女心领域最步调一致的小菇凉月底大婚,要把大家的祝福打印出来。我本来写的是“早生贵子,多多益善”,并且强调就算小两口想再玩一阵子都可以“带着宝宝要”(“要生早生、尽量多生”是我常备的第二条祝福)。结果伊表示“我就是宝宝”,这个话题就这么愉快地结束了。

不过,我还是被激起了斗志,“墙裂”要求落款里面把“少女心”三个字加进去,原文也因此被修正为“早生贵子,多多益善哦~”并且必须保留波浪般的小尾巴。结果伊一针见血地指出:少女心常用字应该是“喔”而非“哦”,这样才算完整而正宗的体例。好吧,大叔又涨姿势咯~……

桅灯下的留守者

张林岚



“留守”这个古代的官职,现代反而频频在社会上出现,从留守女士、留守儿童、空巢留守老人,等等,各式各样的留守人员……见到这个又新又旧的名词时,我们不能不记起来一位默默无闻的“小人物”,他叫刘岚山,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位无名诗人。

抗日战争末期,我在进重庆新民报之前就认识他。所谓认识,也不过是通通信。他爱写诗,我也写诗。我向往延安,想跑陕北;他也这样,而且到过延安。可能既无组织介绍信、证明书,不但没有进抗大陕北公学之类学校,反而被抓进了国民党设在西安的集中营。后来四处流浪,漂流到重庆。朋友介绍他进重庆新民报,当了几个月校对。这时我也因相同厄难,

羁留西安。经一位患难朋友之介,艾丁(新华社内蒙记者),我得以结交了这位诗友,通信中也交流诗作,但不谈政治,也不想谋面。1944、1945年我去重庆新民报后他已离开。1946年我到上海版,竟在报社相见,老朋友成为新同事。我结婚时租不起住房,只能四处“打游击”,他见我苦恼,对我提议可以介绍安徽同乡的纱厂工人在引翔港的贫民窟,租半间茅草顶的板壁泥墙筒屋,每月只需三斗米的房租不必押金(顶费)。我们一同度过“天亮前后”的恐怖、困难时期。这个时期,报社老板陈铭德夫妇已赴港避难,党的许多领导人到了香港,文化人也纷纷离沪。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正在推上日程: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,人民政协的筹备活动

正在紧锣密鼓展开。

就办报的人来说,一个难关却是人才流失、人手短少,上了黑名单的记者编辑包括赵超构在内,都为躲避反动派迫害逃难在外。夜光杯的作者们,都在这个人潮之中流动,弄得版面空虚,无人写稿。

物价飞涨,临近上海解放战争开始时,一张晚报售价涨到一、二、三万、五万……四开一张晚报售价最高时是金元券五十万元。

夏衍的桅灯录熄灭,他已经香港去了马来西亚。二流堂人有的去港澳,有的因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回延安去解放区,左翼作家都已潜伏下来,从前常在报刊露面的名字,再也看不见了。《夜光杯》的编务,袁水拍匆匆交给刘岚山——完全是“私相授就”,因为这样的事无处请示报告,只能说是教一个校对暂时照看一下,每天发点稿子填满版面。上海解放战争打响,刘岚山也不告而别,不知是不是回乡,还是去了苏北解放区?他家在彩石矶对面的和县。

夜光杯一天也没有停地熬过1949年的头一个多月,尽管稿子比平日少,空虚、贫乏了不少,但没有一篇反共反苏反人民的稿子。夜光杯是清白的,纯洁的,光明的,真正的“一捧雪”!

上海解放后不久,刘岚山穿着解放军军装回到报社,他已在军管会文艺处工作,后调北京,进人民文学出版社,任作家出版社散文诗歌组组长多年。与新民晚报失去了联系。

桅灯高举的留守者,他永远低调,默默无闻,出了许多领导人文艺家,二流堂人的书,自己的却很少。